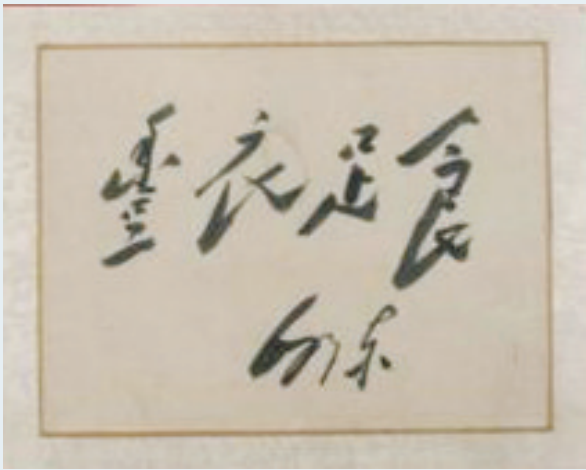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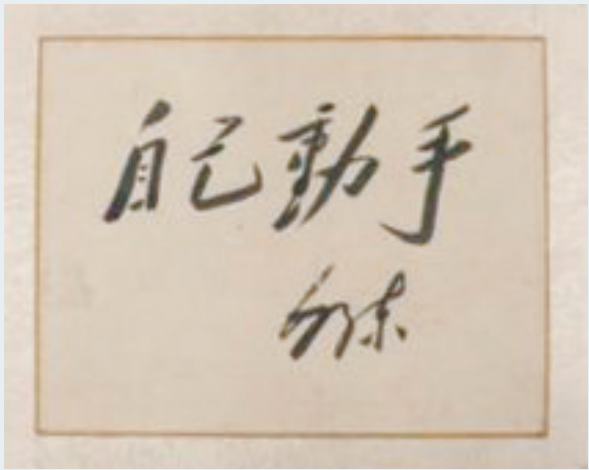




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题词手稿

□ 宋飞帆



1943年，毛泽东为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两份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题写下的珍贵题词，虽然纸面已被岁月染黄，但依旧保存完好、字迹清晰，足见题字者力透纸背的书法功力和保存者的珍视。这是毛泽东于1943年为电影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后改名为《南泥湾》）的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直被影片摄制组组长吴印咸珍藏在身边，题词内容也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经济动员口号，至今广为流传。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日军逐步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国民党政府不仅继续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且动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和根据地的援助。祸不单行，各根据地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水、旱、风、雹、病五大自然灾害的袭击，不少山林、耕地、村庄被毁，粮食、牲口损失严重。灾民弃家逃荒，沿街乞丐迭起，各地疾病广泛流行。

在这种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粮食和日常生活必需品等物资供应陷入极大紧张。干部战士几乎全部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甚至连子弹袋也不能更换，破烂不堪，无法使用。毛泽东回顾当时困难状况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财政经济困难、物资紧张的关头，发展农业生产格外重要。农业生产不仅能维持军民日常生活、发展轻工业提供最迫切需要的物质资料，

也是保持战时给养、维持军事行动的基础。可以说，增加生产与粮食收成是保证抗战胜利的前提。

1938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作报告，指出：“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给，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号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粮食危机。随后根据地开始了小范围的生产自救运动。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并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

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驻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区担任河防任务的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南泥湾一带位于延安东

南约50公里的黄龙山区，人烟稀少，杂草横生，除森林外，可开垦面积达100余万亩。指战员们克服各种困难，战斗在开荒第一线。第359旅的干部以身作则参加开荒小组，定生产指标，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开荒，越是艰苦、困难的地方，越是出现他们的身影，使战士们深受鼓舞。连排班之间、个人之间开展劳动竞赛，互相挑战，迅速掀起了生产运动热潮。

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大丰收。1941年和1942年，第359旅共垦荒播种3.8万亩，收获各种谷物折合细粮达25.5万公斤，还发展了工业、手工业、商业和运输业等，并取得显著成绩。到1944年，该旅不仅实现了粮食和日用

品的全部自给，而且达到了“耕一余一”，开始向边区政府上交粮食。第359旅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创造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为内容的“南泥湾精神”。

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尤其是第359旅在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的突出成绩和经验，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高度评价。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对第359旅官兵的生产自给工作提出了特别表扬，指出“在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做得

比较好些”，并从粮食生产、畜牧业、工业及手工业、运输业、商业、生产计划、生产制度、供给制度、厉行节约等各方面，对第359旅的工作作出总结和赞扬。会议期间，毛泽东亲笔题词表彰了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22名生产英雄。

1943年，延安电影团以南泥湾开荒生产为题材，拍摄了一部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后改名为《南泥湾》），记录了第359旅为响应党的号召，进军南泥湾后，一面开展大生产，一面在秋收之后紧张练兵习武的动人场景。在影片即将拍摄完成前，时任摄制组组长的吴印咸来到位于枣园一所窑洞中的毛泽东家，请他

科学把握装备与战术的关系

□ 董 喆 沈文科

同、制空权、制海权、闪电战、大纵深作战等战役战术理论。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计算机等高新技术的出现让战法更加立体多维，空地一体战、多域战、马赛克战开始成为新的作战概念。但是如果只看到技术装备和战法的这一层关系，那是远远不够的。

除了武器装备推动战术发展外，新的战术设计也能够牵引技术的发展。有时候，战术需求要求研发某种装备，这势必带来新技术的发明。几乎每一场战争，都会催生新技术和大量明星装备的出现。比如二战时各种军事需求，催生了喷气式战斗机、导弹、雷达、原子弹等新装备。以两栖登陆作战为例，因为长期以来缺少较为可靠的登陆舰艇，其复杂和惨烈程度比陆战有过之而无不及。1942年英军在著名的迪厄普登陆战中，就因缺乏足够的登陆舰船，损失近半兵力，最后被德军赶入英吉利海峡中。而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在和日军争夺诸岛的登陆战中，凭借其数百上千的登陆艇，打得日军丢盔卸甲。原因除了美军强大的制空权、制海权以外，还有美军提前根据两栖登陆的战术手段要求，研发了著名的希金斯登陆艇，即便美军实施快捷两栖登陆。再比如为对付大西洋战场上神出鬼没的德国U型潜艇和狼群战术，英军创造性发明了刺猬炸弹和厘米波段雷达，一下子让德军潜艇无处遁形，也让他们有来无回。从这一角度来说，不能单纯坐等装备技术成熟再研发战法准备战争，要敢于超前设计战争，在设计中提出新战法，根据新战法研发新技术、预研新装备，下好未来作战的先手棋。

当然，技术是装备发展的本质，是战争中最活跃的因素，不能完全被动迎合战术，必须前瞻未来技术的发展，再用先进技术生产出新的装备反哺战术，引领战术的变革。例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基本任务就是开拓新的国防科研领域，为解决中、远期国家安全问题提供高技术储备，研究分析高新技术在军事上应用的可能性，像互联网、GPS等当今深刻改变人们生活和作战样式的颠覆性技术都来源于该机构的项目研发，催生了美军战术的多维度升级。因此，要形成颠覆性杀手锏武器装备、降维打击战术手段，就必须紧盯科技前沿，提前锁定许多高风险、高价值、高收益的技术项目，对新想法、怪点子，对关

键核心技术、新兴领域重大装备，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形成边研边试边用边改模式，尽快转化形成战斗力。

先进的技术装备可以赋予老战法以新的生命力。许多老战法背后蕴含的深刻的战争制胜机理，并不会因为时代发展而彻底淡出历史舞台，在新的技术装备的支撑下，老战法在现代战争中仍然可以发挥巨大的作战效力。比如1991年，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军队实施的“左勾拳”战法，其实是古老的斜行序列的现代化改进，所不同的是依靠高科技武器装备，作战实施的范围更大，作战质量更为高效。当前美国海军提出的分布式作战概念，归根到底是二战时德国狼群战术的翻版，远征前进基地概念也不过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的蛙跳战术的升级，但是因新装备的加持，被赋予了新内涵。因此，战法研究并不意味着要从头开始、凭空设计，完全可以通过从古代兵书、现代军事史中汲取有益的战法经验，结合新装备，开发适合于现代战争的战法战术。

最后我们要看到，先进的战术也能弥补技术装备的不足，即便剑不如人，但剑法高于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仍然可以打胜仗。在抗日战场上，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八路军和新四军采取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法，凭借“小米加步枪”战胜了装备更为先进的日军。在朝鲜战场上，尽管志愿军武器不如人，但是凭借“气”的优势，特别是创造性运用新战法，采取出其不意、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的“多路机动进攻战”，阵前反击和狙击相结合的“坚固坑道体系防御战”，分段倒运与集体直达相结合、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多网并举后勤保障战”等先进战法，先后取得了5次战役的胜利，逼迫武器装备更具优势的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签订停战协定。

总之，技术装备与战术战法在本质上是双轮双驱的关系。一方面技术装备的研发制造，催生了各类新战法新战术；另一方面新战法新战术的出现，需要一定的技术装备的支持，倒逼研发新技术新装备。同时，高端技术装备可以赋予老战法以新的生命力，并能支撑新战法战术的设计，而高人一等的战法战术可以弥补装备手段的不足，打赢纸面实力更为强大的对手。

留田突围：一场“无声的战斗”

□ 张大海



留田突围是1941年11月，罗荣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指挥的一场突围战。八路军第115师在罗荣桓指挥下，巧妙迂回穿插，连续突破日军三道封锁线，胜利粉碎了敌人5万兵力的“铁壁合围”。随军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目睹了全过程，写成通讯《无声的战斗》，发表在《战士报》上。留田突围是罗荣桓运用“敌进我进”原则，突破敌人重围的范例，其战法创新的价值在今天仍有启示意义。

大兵压境，形势严峻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在“总力战”思想指导下，以“扫荡”为基础，推出“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等，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妄图迅速消灭抗日武装。从1941年初，日军就加紧了对山东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频繁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三四月间，日军推行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首先在敌占区内强化伪组织，然后再对各根据地进行“扫荡”。7月至9月，进行了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又对鲁南、鲁中、清河等地进行了大“扫荡”。11月初，日军配合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剿灭沂蒙地区共军，消灭其根据地”为目的，由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矢指挥3个师团、4个旅团的主力的一部分伪军共5万余人，从3日起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持续时间近两个月的“铁壁合围大扫荡”，矛头直指八路军第115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等领导机关。

这是抗战以来日军在山东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罗荣桓分工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后，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11月4日拂晓，敌人奔袭驻马牧池（今属临沂市沂南县）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东纵队指挥机关迅速转移到马牧池东北的南塔峪。5日晨，日军2万人分11路大范围向临沂以北的青

驼寺、孙祖镇、留田村一带进行合围，企图聚歼山东分局和第115师师部机关。而此时，第115师师部、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领导机关共5000余人就驻在青驼寺东北的留田一带。而战斗部队只有第115师一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一个特务连。上午，敌人已将留田团团围住，最近的离留田七八里，远的不过10余里，战前形势异常严峻。大兵压境，如何突破敌人包围圈，从内线跳到外线，并粉碎敌人重兵“围剿”，急切摆在了我军指挥员面前。

敌进我进，避实击虚

在危急关头，在留田东南面的牛家沟村，第115师政委罗荣桓迅速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突围方向。一部分人主张，向敌人比较薄弱的东部突围，因为东面封锁线还没形成，力量比较小，突围后可前往滨海地区，那里有根据地，条件比较好。另有一部分人主张向西突围，理由是西面群众条件好，且有泰西根据地依托和接应。第三种方案是向北突围，因北面有山东纵队，可向其靠拢和接应。由于南部是敌人大本营，封锁严密，因而没人提出向正南方向突围。罗荣桓听取大家意见后，提出了向南突围的主张。他说：“同志们考虑怎样突围，主要考虑怎样保存自己，这是对，但是，还不够，应该考虑：既能保存自己，又能粉碎敌人大扫荡，消灭部分敌人，巩固和发展沂蒙山根据地，使群众少受损失或不受损失，把消极突围变成积极突围。”接着，他逐一分析了利弊。

向东突围，很可能钻进敌人预设口袋，而且已侦察发现敌人埋伏的骑兵；向西突围，敌人戒备森严，不容易通过，即便通过了，也是敌人合击目标；向北突围，不但面临日军，还要面临国民党顽军，容易受到两面夹击；而向南突围，乘敌后方空虚，直捣敌大本营，便于牵着敌人鼻子走，变被动为主动。直插敌人心脏，敌人不得不从沂蒙山撤兵，根据地之围不解自解。罗荣桓的精辟分析，特别是不能被动突围，而要以主动突围来调动敌人，巩固发展根据地，以及出敌不意，直插敌要害，把突

围战放在战略战役全局考虑的思想得到一致赞同。随后，罗荣桓宣布了行军路线，明确了行动纪律，要求所有人员一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突围时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响声。

静肃突围，无声战斗

最好的计划，如果执行不力，也会毫无价值。留田突围的神奇之处在于其静肃突围的游击战术和能力。山区道路复杂，偏僻的山路、小道较多，日军不熟悉地形，这些山路、小道便成为游击队秘密行动的最佳选择。5日晚，八路军第115师按照罗荣桓的部署开始突围。首先，从留田东南铁山子附近仅有一公里半的间隙，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下半夜，又从一个2.5公里的间隙中迂回穿插，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至6日拂晓，部队没费一枪一弹，就迅速隐蔽地通过第三道封锁线，顺利地跳出了日伪军的合围圈，安全转移到了50里外的费县汪沟镇埠山庄村。由于组织严密，行动隐秘，机关和部队随后经高里村再转向西，也到达了埠山庄，并在这里隐蔽了一个白天。6日晚，罗荣桓率部继续向西，经诸满村安全转至费县黄埠前地区，成功跳出了包围圈。当时随军突围的国际友人、德国记者汉斯·希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文称赞这次突围是“无声的战斗”。

留田突围，是罗荣桓提出“翻边战术”的成功实践。结合历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经验，罗荣桓认为如果仍然局限在根据地之内与敌人周旋，采用老一套的战法来应对，敌人的包围圈会步步紧缩，我军的回旋余地会越来越小，必然陷于被动挨打甚至无立足之地步。为此，罗荣桓逐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广泛采用了“敌人打到我这边来，我就打到敌人那边去”的“翻边战术”。即把主力部队部署在与敌人接近的边缘地带，当敌人“扫荡”时，主力部队不是在根据地内与敌周旋，而是趁包围圈尚未紧缩时，及时选择敌之弱点，打入敌后方，迫敌回援，使敌人前进的“扫荡”变为向后的收缩。毛泽东在谈到山东抗战时曾这样评价：“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大。”